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上不懈开拓前行*

——张岂之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访谈录

兰梁斌访谈整理

【编者按】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赴西北大学任教。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主编。张岂之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70年来,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传统文化》《顾炎武》《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等。荣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国家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张岂之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道路的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和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问题展开。

一、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道路

兰梁斌:张先生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的故乡江苏省南通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长三角重要城市、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史称“中国近代第一城”。您能讲讲入大学前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吗?

张岂之:我的故乡是江苏省南通市,1927年我在这里出生。南通是晚清状元张謇的故乡。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推进,南通市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水平逐渐提升。我很荣幸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南通危机严重,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经过千辛万苦转移到了后方相对安全的地方。我的初中在陕西省城固县完成,高中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创办者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我深受他的思想的熏陶。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在京招生,我赴京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结果有幸被录取。

兰梁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您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怎样?北大、清华的学习对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哪些影响?

张岂之:1946年至195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读本科。1950年秋至1951年,我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幸运地是,我在大学期间得到了许多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们的指导。当时北大的校长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已经张岂之审定。

胡适会定期举办学术讲演,介绍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我常去听,受到了治学的启发。北大文学院名师众多,汤用彤、朱光潜、杨振声、张颐、贺麟、容肇祖等著名先生的课程,我都听过。当时北大的教授们很多是学贯古今中西的大家,如贺麟教授不仅开设了“西方哲学史”必修课,还开设了“黑格尔哲学”选修课。他首先对黑格尔哲学简要介绍,然后要求我们直接读黑格尔的原著《小逻辑》,并将他翻译的《小逻辑》中文版和德文版、英文版对照,校正和提出问题,展开讨论,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们应传承这种古今中西贯通的治学方法。

当时北大哲学系较年轻的任继愈、齐良骥和石峻三位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先生开设“隋唐佛学”选修课,重视对佛教史料的理论分析,这为我毕业后研究中国思想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任先生指导我先读先秦诸子,然后研习佛教典籍,并鼓励我走学术研究道路。齐先生开设“英文哲学名著选读”选修课,讲授洛克、休谟、斯宾诺莎和康德哲学著作的某些部分,要求先弄清楚哲学家们运用的概念、范畴的含义,然后探究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特色,最后评判他们在哲学史上的贡献,这培养了我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石先生每年都开“伦理学”必修课,涉及中外伦理思想,视野很开阔。石先生借我阅读他的书,并指导我细读其中的某些段落,解决了我的很多疑惑。

北大读书时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研究,自此我决心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兰梁斌:您是如何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道路的?

张岂之:1949年初平津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华北主要城市。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胡绳、何干之、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辗转来到北京,北大文学院请他们讲课。侯外庐先生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课程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主张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成果,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分析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采用“横通”和“纵通”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解读思想家思想的内在结构、社会根源,这些理论和方法我深为信服。侯外庐先生是我步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行列的引路人。

1950年3月,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任命侯外庐为西北大学校长。1952年底,在侯外庐先生的邀请下,我到西北大学工作。西安是一座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在这里处处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创造。我喜爱这座古城,我的第一故乡是江苏省南通市,第二故乡就是陕西省西安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在西北大学我直接受到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的指导,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侯外庐先生在学术上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此后,我主要在西北大学主持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这个研究所是由侯外庐先生于1952年创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发展而来。同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第1—3卷,并参加了第4卷的编写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又同侯外庐、邱汉生两位先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等书。

兰梁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思想的通史著作,从先秦贯通近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思想通史》的编写过程是怎样的?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从事史学研究始于1934年,《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是其第一篇史学论文。后来,他又撰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多种著作。侯外庐先生在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和思想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

的基础上,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组织《中国思想通史》集体撰写,至60年代初完成。全书共五卷六册,第一卷(先秦时期)于1947年出版,侯外庐主编,杜国庠、赵纪彬参撰。第二卷(秦汉时期)、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版于1950年,作者除上述三位以外,还加入了邱汉生先生。1957年,在几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第四卷(隋唐宋元明时期)分上、下两册于1960年出版。第五卷(明末至清代)于1956年出版,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通史》写作的时期正是社会激烈变迁时期,侯外庐先生等学者们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仍然坚持学术研究,最终完成撰写,其动力源自于对学术工作的责任心。

兰梁斌:《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作者中除了侯外庐等先生外,还有“诸青”,请问“诸青”的工作是什么?参与编写第四卷工作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岂之:“诸青”是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和我的集体笔名。侯外庐先生为了使年轻人尽快转变为成熟学者,与我们平等相待,给予信任,要求大家集体坐班,每天都会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我们交流,不会因为观点不同就批评责备。为了既锻炼我们的古文献功底,又使我们了解他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侯外庐先生指导我们逐条校对《中国思想通史》第一、第二及第三卷等著作的引文,系统考察引用的史料和观点是否相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年轻人在侯外庐先生等学者的指导下,彼此之间互敬互爱、互为师长,成长很快。“在水中学习游泳”,这是侯外庐先生培养年轻人的基本经验。他放手让我们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写,让我们在科研实践中成长,初稿于1959年夏天完成。我们几位年轻人不仅承担了执笔撰写的重要任务,还从事着全卷的统稿和组织联络工作。侯外庐先生统筹全局的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攻关的方式,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这种科研实践中,我们掌握了学术研究方法,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几位青年同志相互改稿,相互学习,互相尊重,从未因署名之类的事情发生任何争论。

兰梁斌:您认为《中国思想通史》的学术价值是什么?

张岂之:《中国思想通史》是近代以来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思想的通史著作,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特点等。

侯外庐先生曾研究法学、政治经济学,翻译《资本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经济史,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侯外庐先生吸收、参考王国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依据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出与古埃及、古希腊在使用铁器的条件下步入文明社会不同,中国氏族社会在未使用铁器工具的情况下,走向了文明社会,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中国社会史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和前提。除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入研究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侯外庐先生还提出“封建土地国有制”、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等理论来概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侯外庐先生学术方法的宝贵遗产。即使今天对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但作为社会史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仍不能被轻视。

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侯外庐先生等人发掘了一大批被称为“异端”、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思想家。这些“异端”思想家与封建“正宗”思想和神学迷信对立。有的学人质疑如此划分的必要性和准确性,但侯外庐先生认为我们看待中国古代史,不能只关注古代文化光辉灿烂的部分,还应逐步廓清封建专制主义和家族宗法思想,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助力。这样的研究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中国思想通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主,结合乾嘉考据学方法,体现了侯外庐先生等学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精深的国学修养的统一。《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中,旁征博引,史料丰富,以至有学者认为这部书还可以作为中国思想史的资料汇编来读,是理论与史料的完美结合。

兰梁斌:2016年,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33卷本《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您认为今天我们应如何认识与评价侯外庐先生的学术特色与学术贡献?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创造性地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丰富史料融通,在批判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优良传统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民族化。首先,侯外庐先生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用十年时间翻译《资本论》,就是为了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真谛。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了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始终贯穿于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中。其次,侯外庐先生是坚持真理、不断开拓进取的学者,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有学术勇气指出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的定义不无商榷之处,并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论述生产方式的。今天出版他的全集,会使人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所借鉴和启示,即或不同意侯外庐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重新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会有很大收获。再次,侯外庐先生在思想史研究中重视思潮、学派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一致的,这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他强调探究社会思潮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反映的时代风貌,分析不同思潮、不同学派,甚至同一学派内部不同人物的思想特点和社会影响的差异。最后,侯外庐先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往往偏重于欧洲,我们不可能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结论,中国学人不能以欧洲模式套用于中国历史。他多次强调,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历史,在遵循中外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的同时,要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

今天我们对侯外庐先生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无论准确的还是需要修正的,都愈发看的清楚。侯外庐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道:“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看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跡,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②从简单模仿、照抄照搬到不再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丰富的史料相结合,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探索标志着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到了新阶段。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以后,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应承认这样的事实,并感谢学术先行者(包括侯外庐)所作出的贡献。侯外庐先生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今天,我们应认真研究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继承其科学精神与独立见解。我们应大力学习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

兰梁斌:有学者认为侯外庐及其团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自成体系,可称之为“侯外庐学派”,您是如何看待的?

^① 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书局1946年版,“再版序言”,第1页。

张岂之:侯外庐与赵纪彬、杜国庠等学人,以及李学勤等“诸青”,一起探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等代表性成果,形成了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体现了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当代学术评价中,有的学者提出“侯外庐学派”这个名称,其实并不过分。对他们一起奋斗、一起共事的情况,侯外庐先生在晚年有很感人的回忆:“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所中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①运用马克思主义传承发展中国的历史遗产,如此高远的追求,值得我们后辈学人学习。继承他们开辟的学术道路,努力建设中国思想史学科是我们后辈必须承担的责任。

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持续开拓

兰梁斌:在老一辈学人指导下的团队协作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解决研究中的疑难,结出硕果。您能否介绍一下《宋明理学史》的编写情况?

张岂之:由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只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因此理学研究尚需继续深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侯外庐先生即倡议编著《宋明理学史》。侯外庐先生请邱汉生先生主持此事,他在《宋明理学史·序》中说:“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材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作了积极的贡献。”^②

《宋明理学史》(上、下卷)的主编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参加撰著的学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我协助邱汉生先生做了一些统稿工作。侯外庐先生和邱汉生先生将我列名于主编之中,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在思想史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方面有所提高。1981年,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之邀,去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邱汉生先生要我就近了解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宋明理学研究的情况,并写成书面报告供参考。根据邱汉生先生的意见,我给他写了几封信,算是“书面报告”,有几封收在《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一书中。

兰梁斌:《宋明理学史》对理学研究有哪些推进?

张岂之:一方面,与《中国思想通史》相同,侯外庐先生认为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编写中注重解决疑难问题,得出“独立自得”的学术见解,有何种观点就写何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史》的编著过程中,邱汉生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另一方面,与《中国思想通史》有所不同,《宋明理学史》专注于探究理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理学中的重要范畴概念,分析理学思想中各个流派的相互影响,即以理学思想本身为探讨对象。相比《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在横向层面对理学的研究更深入。该书于1984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上、下卷。

^①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27页。

^②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张岂之修订:《宋明理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兰梁斌:除了专门的学术论著外,您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特别注重《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写,您能谈谈编写教材的缘起及教材的重要性吗?

张岂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几位朋友在《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上,用了不少时间。这并不是申请的课题,而是我们自己觉得这件工作重要,才决心去做的。随着80年代陆续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在教学中发现,刚入学的学生阅读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难度较大,当时也没有合适的其他思想史教材,而中国思想史课程是思想史专业研究生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设想和计划组织学术兴趣相近又各有专长的学者一起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

教材与专门的学术研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编写教材要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路和学术观点,不能停留在已有知识和思想的移植照搬,要体现著作的特点,不仅仅是编。教材编写,既可以将学术研究成果推广普及,又可以使教学和研究互相促进,以教学中发现的有意义的问题推动学术研究。我主编的几部教材,强调供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时的不同特点,强调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编写中。

兰梁斌:您能否介绍一下《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写过程?

张岂之:1985年编写启动,我担任主编,刘宝才、龚杰、任大援、李晓东四位同志参撰。1989年,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思想史》教材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大学文史专业本科生在使用中,提出读起来有困难,建议出缩写本。本着教学科研相互促进的精神,我们对原教材进行缩写,最后四十余万字的缩写本于1993年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编写教材,还需要不断学习、总结经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思想史》教材于2003年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第2次印刷。我认为学术专著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成果形式,用心编写的教材不仅可以体现学术研究的深度,而且在成果的推广方面也可以展现研究的广度。高校人文学科研究生的教材不能仅仅注重简要,还应该不断创新,融入学界或者编著者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兼具学术专著的特色,既有学界研究成果的汇集,也可以有编著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成果的体现。在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还可以作较深入的阐述,以便全面地阐述编著者的观点。所以,教材和专著有所不同。基于此指导思想,我们力图将修订版《中国思想史》修订成教材兼有学术专著性质的书稿。我组织团队对《中国思想史》(七十余万字本)重新增补、改写,于2012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90万字本(上、下卷)。

兰梁斌:您在《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中坚持哪些原则?

张岂之:教材的编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具体而言,我提出了如下原则:一是“力求结合历史发展的线索给学生们介绍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内容……编写时应注意从历史实际出发,把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原因、历史作用写清楚”;二是“力求准确地给学生们介绍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史料,指出书名、版本、刊印时间等”;三是“书中不宜凭空发议论,亦不宜作过多的引申和发挥,而力求抓住比较典型的材料,加以解释、分析,得出相应的观点,借此给学生们以方法论的启示”;四是“注意教材内容的稳定性”;五是“文字力求简洁、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各种带有极端评价性的词句和公式化的虚文”;六是“对中国思想史中特有的范畴、名词术语,力求作准确的解释”。^①这六点原则是我们编著教材的基本指导思想。上述编写原则在我主编的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原序”,第1—2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中也得到了贯彻。

兰梁斌:21世纪初,您主编了《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材,为什么要提倡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

张岂之:200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请我组织编写《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材,计划既写思想史内容,又有文化史内容。这与我当时考虑的问题不谋而合,即撰写一本既叙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成就,又书写与思想史有联系的文化背景,但仍以思想史为全书中心的教材。因此,这本教材主要目标就是努力将思想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创造文明的历程,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既有许多经验,也有不少的教训,这些就称之为文化。因此,文化是以创造和建设文明为目标的。正面积极的经验就是优秀文化。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中,不同的层面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历史文物、艺术品等,用观念文化中的价值观加以联结,形成中华民族多彩的文化总体。这些价值观,我们称为思想史。因此,思想史和文化史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这本教材以思想史(文化的核心)为主体,旁及文化的其他方面。

兰梁斌: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六卷九册的《中国思想学说史》,这套书的撰著经过是怎样的?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哪些推进呢?

张岂之: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可拓宽的空间很大,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经过准备,1999年我们开始撰述《中国思想学说史》,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书中各卷均由国内思想史学界的优秀学者执笔。内容包含了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各个重要时期的重大思想及各家学说的阐述和研究,对《中国思想通史》以来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进行总结,比较充分地吸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以思想学说为契入点,揭示思想产生的学术土壤,力图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历程及主要内容作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把中国思想史写成为真正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生产发育的历史。全书坚持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注意思想学派史的微观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书中能够传承并发展我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

兰梁斌:《中国思想学说史》尝试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编著中您是如何借鉴优秀的中国学术史传统促进思想史研究的?

张岂之:早在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由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已对学术史研究作了尝试。该书力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将我国近代历史哲学与近代史学方法作较细致的比较分析。我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学术史研究传统,《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学术史开创作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歆《七略·诸子略》、古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等都含有学术史内容。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学术史的开创之作。清初,《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学案体学术史的重要成果。到了近代,学术史著作有梁启超、钱穆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等。中国学术史传统的特点可归纳为:“重视文献资料考订”“重视学派的区分和研究”“重视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及“关注不同思想学术派别的融通或会通”等。学术史是中国古代宝贵的文化财富,吸收学术史的优长处,就要加强思想史学派间差异的研究,还要深入分析各学派间差异是如何转化为融通的,努力克服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化、公式化问题,以图更加接近思想史的原貌。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

兰梁斌:近代以来,有关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传入后,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了显著推进。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思想史仍未解决它的研究对象、范围等问题。老一辈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如蔡尚思先生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中认为,思想史就是社会科学史,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思想等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之学科的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是排除在外的。这种看法对我们有启发,但在今天来看,仍要做些补充。如,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精华,不应被排除在思想史之外,哲学史应是思想史的主干内容。

1983年,我在《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一文中指出,思想史“要研究每一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意识是怎样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形成的,社会的变动如何决定着思想内容的变化,而思想体系、观点的出现又如何直接、间接地推动或阻碍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上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去探索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并通过思想的研究反过来看社会的面貌,看思想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当然,思想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只有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以,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的学科。”^①我在《中国思想史》教材的“序”中也进一步指出,“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是综合研究。”^②

兰梁斌: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您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

张岂之:在思想史研究和教材编写中,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然而,在具体研究中,我们注意到,社会存在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带有很强的辩证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中的理论思维部分并不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故此,我在《中国思想史》教材修订版“新序”中写道:“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永远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天,我们还要不断研究他们的思想,传承他们的思想精华。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古代历史的环境中,其思想中既有与今天时代性相符的方面,也刻印了古代历史社会某些滞后方面的痕迹,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今天和未来都是必要的,既不全部肯

^① 张岂之:《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原序”,第2页。

定,也不全盘否定,以揭示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实质和现代价值,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创新。”^①

兰梁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您认为还应注意运用哪些方法?

张岂之:从学科特点来看,中国思想史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但对其研究又涉及多个学科门类,所以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和基本要求。我在研究中,除了长期坚持文献阅读,保持理论思考和不懈地进行学术创作外,更重要地是受到外庐先生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在研究中注意运用以下方法。一是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研究思想史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对社会的作用、思想的主要内容等问题。二是注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思潮研究能够集中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相互关系。思潮的不断演变也能窥见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这是社会思潮史研究具有的独特方法。三是注意思想源流的演变研究,前代思想对后代思想的影响,后代思想对前代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辩论和融合,注重思想渊源的讨论和思想的相对独立性,这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四是要揭示每一个学派、每一位思想家思想的内部关系,每一种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思想家的思想结构展现给人们。由于思想的发展和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如同一位思想家的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都有可能不同,所以需要作全面研究。五是由于思想史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我们在研究中一直注意思想史与科学技术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结合,不断拓宽思想史研究的视域。将思想史与科技史结合研究,尤其是注重思想史与多学科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借鉴,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是主要方法,其他方法只是在某些局部和具体问题上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兰梁斌:您认为应如何看待中国思想史的特点和作用?

张岂之:首先,中国思想史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的分量较少,思想家们在论述自然哲学时,有不少是道德伦理思想的扩大和延伸。这在中国儒学思想中表现得格外明显。道德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成为主要部分。其次,中国思想史重辩证思维。古代的思想家们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概括出许多理论观点,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战国时期诸子之学如此,后来儒家、道家、佛学诸思想体系也无不如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是辩证思维的宝库。再次,中国思想史重“天人和谐”的思维方式。“天人和谐”的表现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主张天人相通是相同的。儒学追求将人间的道德律令提升为天的道德律令,力图论证人类社会和自然宇宙的秩序都受到道德律令支配。与儒家不同,道家从“道法自然”的途径论证“天人和谐”的理论。这都展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丰富性和特有风貌。最后,在形式上,中国思想家主要通过注解经书来阐述个人的思想,所谓托“圣人”立言,很少独立发表见解,所以中国思想史和经学史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思想的历史作用问题,需作细致分析。概括言之,历史上产生过的每一种有影响的思想体系,都具有社会作用和理论思维的作用。就社会作用而言,思想的政治作用只是思想的社会作用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以政治作用代替了思想的社会作用的其他方面,更不能将思想的其他方面的作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上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修订版新序”,第2—3页。

用归结为政治作用。甚至存在有的思想体系政治作用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产生过有影响的政治作用的情况。就思想体系的理论思维的作用而言,我们需要认真剖析,真实地研究思想体系中各个环节对人类理论思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切忌简单化评判。

兰梁斌: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展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您觉得应如何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是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二是在儒家思想研究、道家思想研究以及宗教思想研究等方面都实现了新突破。中国思想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我深信这门学科一定会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中国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已具备了开拓创新的条件和需要。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思想史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有的学人运用其他理论与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促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学术上“和而不同”是思想史研究的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规范,按照学术规律实事求是的讨论,不能有绝对化的观点,学术才能发展繁荣。我们要发扬中西融会的创新精神,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应注意新史料的发现和史料考证意识的加强;对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方法,尤其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方法,应加以总结继承;加强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加强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注意思想史学科队伍建设;思想史研究还应加强对世界走向的冷静思考,增强“以人为本”的人文信念。

多年前,我还提出建议:一是要编写《中国思想史史料学》;二是要加强地方思想史的编写。我们编写的《陕西通史》中就有“思想史卷”的内容,将来还可以写《陕西思想史》,进一步丰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兰梁斌: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您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在长期治学中形成的学术理念?

张岂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主流,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至于一度走了弯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不能有片面性。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套用片言只语,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我形成了三个基本的学术理念。一是兼和。做到兼容并包、和谐统一,开阔学术视野,构建更宽广的学术胸怀,向国内外同行多学习。二是守正。做人、做学问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做正派正直的人,学术研究上走正道。如果在守正问题上有很大的弱点或缺陷,一个学人就站不住脚。三是日新。即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思想活跃,不断创新,思想僵固就很难促进学术进步。这三个理念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兼和是基础,守正是指导,日新是灵魂。

四、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点

兰梁斌:近年来,您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开始了这项工作。能否请您简要介绍《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一

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看法?

张岂之:是的。199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一书。书中的选文大体上能表达当时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些粗浅看法。我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包括“自然”之学、“有对”之学、“会通”之学,以及“人学”等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须对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发展,继承优良的方面,抛弃陈腐的方面,使它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相吻合。吸收改造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使民族美德和古代理论思维的真理的粒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介绍、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学界的一件大事。

兰梁斌:儒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您认为儒学即“人学”?

张岂之:从儒学形成可见儒学即“人学”。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将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关于“人”的学说。仁是孔子“人学”的基本范畴,是包含个人修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学说。儒家“人学”深入讨论了多种道德范畴的内涵,要求人们按照道德的要求践行,最终实现社会和睦,社会秩序安定。“人学”是关于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孔子、孟子及《礼记·礼运篇》提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大同”理想都是“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学”也是人与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学说,到荀子时成为理论体系。离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不能成其为人。“人学”还是人的认识学说,强调认识不能局限于一隅,不能趋向极端,同时强调认识事物要从多样性中去寻求和谐,即和而不同。“人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大贡献。

兰梁斌:199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2004年、2005年还分别出版了英译本和插图本。本书的写作缘起和目的是什么?

张岂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公开出版物中有许多文章介绍西方的各种文化哲学理论,这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但也有不足,就是离开具体的文化形态去抽象地议论文化哲学理论。当时有些议论贬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高扬西方文化哲学。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力图写一本简明扼要、宣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小书,其中有关文化哲学的讨论和具体材料融合,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1993年夏天,我草拟出全书的章节,写成“绪论”。在“后记”中,我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研究祖国优秀文化的学术工作者,我们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自感能力有限,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①

兰梁斌: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张岂之:199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一本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书,名为《中华人文精神》。经过修订补充,该书于200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撰述的目的在于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将此精髓称之为“中华人文精神”,包括“人文化成”“刚柔相济”“究天人之际”“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及“生生不息”等核心内容。以此为基础,学习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该书认为以天人之学等为代表的12个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

兰梁斌: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主编的《中国历史十五讲》。在这本书中,您对历史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后记”,第276—277页。

和文明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张岂之:出版《中国传统文化》后,我又组织撰写了《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这本书的内容涉及文明起源、政治制度、古代思想等15个专题,是一本介绍中国历史的普及性读物。贯穿全书的主线是:“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看历史的演进。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中国文明史。具体来说,这是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演进历史。”^①因此,这本书大体就是叙述这四种文明的内容,弘扬中华文明。

兰梁斌:您曾多次提到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其内涵、特色和意义是什么?

张岂之:“会通”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运用于认识论领域就是主张会通或贯通的中庸之道。中华文化“会通”之学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第二个特点是对域外的思想文化不排斥,强调域外文化的优长处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而不是相互冲突与对抗。第三个特点是会通需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辩实现。第四个特点是要对历史上的“会通”进行具体分析,不同的“会通”精神存在高低优劣的分别。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与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会通”精神渗透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全过程中,我国人文学术工作者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努力做到中西贯通,通过对话与交流,使中西文化的核心理念相互比较、相互补充,这是一项繁重而必须要做的工作。

兰梁斌:20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因素,出现了“国学热”,您认为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岂之:选择中华连绵不断的悠久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内容进行宣传介绍是必要的,“国学热”的兴起也反映了人们有此需求,应予以肯定。有关国学的含义,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认为,国学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指的就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培养国学专业的本科生,应该重视文献研究与教学、重视考古学及其成果类别的课程、重视经学研究的课程、重视世界学术之介绍,在中西古今、学用结合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体认。至于以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冒充精华,为牟取私利而打着国学的招牌,也是有的,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可以此支流当作主流,要理性看待“国学热”。

兰梁斌:您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应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么中国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会通之点呢?

张岂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有会通点的。二者的会通点集中于“人”的研究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学者提出儒学即“人学”的观点,我也有相同的认识。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思想家研究“人禽之辨”“文野之分”,认为人有道德自觉,受到道德教化,经过个人的努力和锻炼,道德修养能够得到提高,就能逐渐成长为“君子”,并能够继续向圣贤的境界迈进。这些思想观点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人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科学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不可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前进,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逐渐实现。

①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2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古代儒学论述的“人学”引导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境界,是有关如何成为君子的学问,然而儒学没有揭示人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人学”是有关人的本质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人学”并不排斥儒学“人学”。儒家君子之学是走向人的科学的重要起点。在人的科学指引下,人们还能更准确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使精华得到传承发展。

兰梁斌:近年来,您写了多篇论文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特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您认为应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张岂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和制度规范,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能够为民族复兴提供动力,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民族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我们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基本命题和我们时代的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当前,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坚持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这样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作出贡献。

兰梁斌:您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国家兴衰的命脉,是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您能否谈谈我们今天增强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是什么?

张岂之: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百家争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诸子百家标志着中华文化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各家在会通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其他家的理论,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新之路。长期的国家统一,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好的氛围。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兰梁斌:在 21 世纪,您认为应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张岂之:放眼 21 世纪,解决人口、污染、现代病等问题,必须依靠全球的综合治理。“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推动社会高度发展,给社会带来幸福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现代病”。这些“现代病”的解决需要注重精神生活的调剂。中华文化中的一些内容,经过创造性转化,一定能为世界上较多的人所乐于接受,参与解决“现代病”的问题。

在 21 世纪,我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能够成为世界文化的主体,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只能是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的文化,使外国优秀文化与本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中华文化在 21 世纪的昂扬,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还很少,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做文化走出去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中国人在 21 世纪,既要发扬本国文化的优点,消除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要注意吸收其他国家文化的长处,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

(访谈整理者兰梁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710127)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